

論《南方移民村》作為報導文學文本的可能

蔡旻軒ⁱ

摘要

《南方移民村》一書中，濱田隼雄以鹿野移民村為背景，記載私營移民村的歷史樣貌與當時代的政策、經濟概況，就前行研究成果來看，書中所呈現的歷史事件具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顯見《南方移民村》的「歷史價值」。本文認為，從「歷史價值」與「真實性」作為報導文學的切入角度，探看濱田隼雄將當時代的移民現象與農業經濟為主體，自文學的敘述提供讀者精確的資訊，從而探討《南方移民村》作為報導文學的可能。

其次，報導文學係透過新聞事件、議題的報導佐以文學的筆調使讀者了解社會現象，濱田隼雄以小說的方式描寫太平洋戰爭前，一群日本北部的移民為求更好的生活而離鄉背景到台東鹿野移民村拓荒的故事。通篇以全知的觀點進行書寫，在敘事者不等於寫作者的前提下，或許無法周全讀者視角以及表述作者的主觀見解。然而，「新新聞學」以小說的筆法，將報導文學開展至第三人稱的敘述視野，以全知的視角帶出敘事觀點，讓報導能配合小說特有的書寫技法，以場景來再現時空，使「真實」得以被重現，報導文學的困境得以舒展。

筆者藉由文本的再審視，讓《南方移民村》自報導文學的角度重新切入；過程中，將自文獻資料的比對探《南方移民村》文本中的虛／實，並以美國新新聞作家伍爾夫所主張的寫實主義技法，檢視濱田隼雄寫實主義小說之書寫策略。

關鍵詞：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報導文學、新新聞、鹿野鄉志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二年級生。

A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NanPou IMinSon" as a Reportage Text

Tsai, Min-Hsuan

Abstract

The method of this paper depends in historical value and authenticity, looking how Hamata Hayao using literature strategy to show readers about the times of immigr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discussion the possibility of Reportage.

The historical novel "NANPOU IMINSON" written by Hayao Hamada , who was one of the active writers in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Hamada using fiction narrative to write the people from Japan to Taiwan, just expect for a better life. He also concentrates on the description for these Japanese immigrants in Luh-Yeh Village, Taiton.

"NANPOU IMINSON" reflects the profound immigrant problems through an omniscient viewpoint, it might not fit in Taiwanese Reportage, bu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ose strategies and skills Hayao Hamada had used are identical to the new Journalism, which might be a new boundary of the Taiwan Reportage Text. In sum, this paper will re-survey the "NANPOU IMINSON" by the New Journalism reportage conventions; shed the lights on the ideal and real.

Key words: Hamata Hayao, "NANPOU IMINSON", Reportage, New Journalism, History of Luh-Yeh Township

一、前言

濱田隼雄，1909年生於日本宮城縣，在1929年考進東北帝國大學，專攻法國文學。1932年大學畢業後，在《實業時代》雜誌擔任記者，撰寫經濟相關評論，葉石濤認為，「在東京《實業時代》當記者，據說他開始左傾。事實上在《南方移民村》裡也可以看到這左翼思想的蛛絲馬跡。」¹譯者黃玉燕則指出濱田隼雄的左傾思想早在大學之時就已展現，「考進東北帝國大學。時值日本普羅文學興盛時期，濱田隼雄的思想漸漸左傾，研究馬克思主義，結交社會主義者。」²

學生時期所養成的左翼思想，以及身為財經記者的背景顯露在文學作品上，成就了他寫實主義作家的特色；學者橫路啓子便曾指出長篇小說《南方移民村》寫出了內地人生活在台灣的不安與困惑，堪稱是濱田隼雄展現寫實主義的一大代表作³。

濱田隼雄以既有的記者身份書寫台灣經濟方面的評論，判斷此時期的評論為《南方移民村》一書的奠基資料；確實，《南方移民村》裡提及許多經濟面與政策面的因素，以濱田身為記者的背景，不難將其經濟專業應用於書寫上⁴。來台後的濱田隼雄，因與西川滿結識，其作品多發表於《文藝台灣》，雖然此時的書寫開始著眼於台灣的地景，並以農民的角度書寫他們的生活環境⁵，可惜關愛的

¹ 葉石濤，〈寫在《南方移民村》前面〉《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5。

² 黃玉燕，〈濱田隼雄與台灣〉《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10。

³ 見橫路啓子，〈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論——以「更正」為中心〉《東吳日語教育學報》36期，頁109。

⁴ 除了記者的身分外，萬里光悅在介紹濱田隼雄時，曾提出濱田氏「過去閱讀的分野亦主要集中於社會經濟方面。大約就在那段時間裡涉獵了台灣製糖工業的研究文獻，也作了筆記。這段時間的用功令他日後寫《南方移民村》或〈草創〉時，言之有物。」可見記者的身分及閱讀習慣的偏好，明顯對其小說帶來影響。參見萬里光悅，吳豪人譯，〈本月人物——小說家濱田隼雄先生〉《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頁311。

⁵ 淺田實男認為《南方移民村》帶來的啟示，在於濱田隼雄用「正確的寫實主義精神」，描寫自然與人文所表現出的種種現實面貌，濱田氏不只專注於現實中的鹿野村，也把眼光擴大，進而凝視其他台灣現實中的過去與當下，讓不同現實穿插於敘事主軸，是這本書「欲罷不能的重要優點」。同時，這本書也提高官民對內地農民移民村居民的關心，將「無比的社會意義」曝現於讀者眼前。參見淺田實男，涂翠花譯，〈《南方移民村》的啟示〉《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頁6-11。

眼光始終侷限於日人身上；所陳述的台灣，除了地景、政策與經濟外，其餘生長在台灣的本島人物，面貌多是模糊的。

許是這樣的原因，濱田隼雄與《南方移民村》受台灣文學界的探討不多。期刊論文部分所探討的面向有藉文本與歷史對話，突顯內地移民事業與帝國主義所呈現的問題點，如學者朱惠足在〈日本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開拓先鋒——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的東台灣「內地人」移民〉⁶，仔細分析小說文本並與《台灣時報》在當時代的報導兩相比對，剖析日本移民在當時代的生活經驗；以具有時效性的新聞報導來印證文本中所呈現的寫實部份，在在可見《南方移民村》在報導與真實之間的關係，於本文而言具有相當地啟發。

另外也有探究濱田隼雄的創作意圖之論文，如學者橫路啓子於〈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論——以「更正」為中心〉⁷，思考濱田隼雄的意識，在《南方移民村》中的更正與轉變究竟為何，橫路啓子認為濱田氏的意識無論戰前／戰後都有一貫的寫實與社會主義傾向，此見解對於筆者意圖探討之報導文學中的書寫者意識亦具有相當的支撐性。除此之外，自文本的角色來進行分析以探討知識份子之形象表現的，有林雪星在〈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裡的知識份子表象——以醫生神野圭介為主〉⁸中，探討神野圭介在移民村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至於文學史方面的考證，則有郭祐慈的〈文學與歷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文學史定位〉⁹，探討「御用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學史脈絡下所處的位置；並論《南方移民村》的地理與政策背景，認為此書之所以定位模糊源自於不同的歷史史觀，以及差異的爭論角度。郭祐慈並依據南方移民村與史料的辨證，探討其歷史價值，主張《南方移民村》一書，除了文學的價值，更具備歷史資料的意義。由這樣的歷史資料來探看當時代的人物樣貌，提醒了研究者在閱讀此書時所

⁶ 朱惠足，〈日本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開拓先鋒——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的東台灣「內地人」移民〉《文化研究月報》24期，(2003.2.15)。

⁷ 橫路啓子，〈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論——以「更正」為中心〉《東吳日語教育學報》36期(2011.1)。

⁸ 林雪星，〈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裡的知識份子表象——以醫生神野圭介為主〉《東吳外語學報》(2009.9)。

⁹ 郭祐慈，〈文學與歷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文學史定位〉《台灣風物》56卷3期。(2006.9)。

應注意的多重面向¹⁰。

可以發現，上述論文的著眼點又多著眼於文本與歷史脈絡的探討。確實，《南方移民村》書中所呈現的歷史事件具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濱田隼雄以「鹿野移民村」為背景，記載私營移民村的歷史樣貌與當時代的政策概況，從而帶出了《南方移民村》的「歷史價值」。本文認為，自「歷史價值」與「真實性」來做為切入報導文學的角度，探看濱田隼雄將當時代的移民現象與農業經濟作為主體，以文學的敘述來提供讀者精確的資訊，許是《南方移民村》作為報導文學的第一個可能。

其次，報導文學係透過新聞事件、議題的報導佐以文學的筆調使讀者了解社會現象，其中不乏作者對事件的描述與見解¹¹。在一九三〇年代，楊逵便曾為「報導文學」定了如下定義：

- 第一、 極為重視讀者；
- 第二、 以適時的報導為基礎；
- 第三、 筆者對應該報導的事實，必須熱心主觀的見解向人傳達。¹²

訂定之初的楊逵是以抵抗的立場來揭露真實，試圖開創報導文學；以楊逵的立場來探討文學的真實及內涵，更早之前，他就曾在〈新文學管見〉中提出心目中「最高的藝術」的看法：

¹⁰ 郭祐慈在這裡提出的不同要素有：主導者、地點、人物互動、時代背景，以及各方面如何交互影響而使移民村面臨不同的情況。筆者認為此歷史脈絡考量之下的要素，以6W分析來看，亦能符合報導文學所必須的要點，筆者試分析之：

Who	日本移民	Where	台東鹿野移民村
What	移民的經濟、植栽、生活問題	Why	殖民政府鼓勵日人移民來台開墾
When	大正年間到太平洋戰爭之前	How	移民的困境如何發生

¹¹ 學者須文蔚與林淇濤二人曾對「何謂報導文學」以及「報導文學的書寫策略」有所討論，須文蔚自一九三〇年代談起，挖掘報導文學的深度，以討論文學介入社會與政治的雄心。認為楊逵作為左翼文學作家的代表，以報導文學來強化文學的社會性。林淇濤則以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的報導文學作品分析其中的書寫策略，檢視並試圖開創報導文學書寫的其他可能。參見：須文蔚，〈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向陽、須文蔚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6-43。林淇濤，〈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3期（2013.3）。

¹² 楊逵，〈何謂報導文學〉，收於彭小妍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頁503。

人類與生俱來的欲求是悲憫不幸、痛責不法、追求更好的生活。這是大眾的心聲。符合這種普遍大眾的欲求，真實地表達人們對這些切實的普遍性問題的感受，並能夠從心靈深處打動大眾的心，這種作品就是最高的藝術。這種藝術，技藝或技巧必須和內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¹³

這段話可看出楊逵一貫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傾向，他進一步提出其所認為的文學除應符合悲憫不幸、痛責不法、追求更好的生活外，它更應是與大眾親近，進而打動大眾的心。由上述理念可探知楊逵所認定的報導與文學間的關係，於此，筆者認為同時期由日人作家所寫的《南方移民村》也有符合報導文學的可能。

濱田隼雄以小說的方式描寫太平洋戰爭前，一群日本北部的移民為求更好的生活而離鄉背景，移居到台東鹿野移民村拓荒的故事。通篇以全知的觀點進行書寫，在敘事者不等於寫作者的前提下，或許無法周全讀者視角以及表述作者的主觀見解。然而，自時代、背景等方面觀察，所呈現的景象不僅符合了楊逵所指稱的「適時報導當時代的現實」，它同時又表述當時代身在東台灣的日本移民們對於生活問題所面臨的「普遍性感受」。因此，筆者試圖以報導文學的角度，探討濱田隼雄在書寫《南方移民村》時，其「新聞的眼」¹⁴所見之現實／事實為何？當書中的鹿田村是以台東鹿野村為變貌，而神野圭介其實是神田全次的形象投射時，濱田隼雄這樣虛實交錯的小說技法，是否能夠成為報導文學的另一種可能？

二、南方移民村與報導文學

談及報導文學，必須分辨的是報導文學作為一種文體，所欲陳述的真實，與文學技巧面的虛構該如何可行？對於被看作是新興文體的報導文學，高信疆則持反對意見，因為：

¹³ 楊逵，〈新文學管見〉，收於彭小妍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頁308。

¹⁴ 出自高信疆對報導文學的廣義定義，原文為：「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與現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法」。參見高信疆，收於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永恆與博大》(台北：東大，1990)，頁26。

當我們重新回顧文學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人類的文學，當它一開始的日子，就具備了強烈的報導色彩。雖然沒有「報導文學」的自覺，但那些傳遞了無數生活訊息、民情風俗、個人見聞的作品，無論是歌謠也罷、傳說也罷、史詩也罷，都裝滿了實質的人生與歷史現象。¹⁵

顯然，高信疆所認定的文學，最初、最強烈的功能就是為了報導而存在，即文學與報導本身的虛／實無有違背。進一步探討高信疆之定義，當「文學」是一沒有自覺，又能傳遞了無數生活訊息、民情風俗、個人見聞的作品時，「文學」便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暗示、成就了報導文學。我們可以說，報導文學便是文學最原始而無機的樣貌。當然這是站在較為寬廣的視角下所定義的報導文學樣貌；於此一前提，只要是揭露「事實」的文本都可稱作報導文學，高信疆試圖讓報導文學帶到一個更易接觸的位置，但這還不足以作為報導文學的定論。

再談及報導文學的「報導性」與「文學性」，沈謙曾自兩方面來切入：

第一：報導性。報導文學不應該停留在單純的報導事實，也不只是眾所罕知的事物和環境的介紹。作者應該提供背景的認知，挖掘事實背後隱藏的意義。作者在選擇題材與落筆時必須有其文化理想。不但要報導表面現象，還要探尋根源，除了外在活動的記錄之外，還要有精神的關照。第二，文學性。報導文學既是文學的一種，它必須具備文學的形式，它不同於收集整理資料的報告或論文。應該採用文學性的語言，帶著藝術技巧和感性的色彩，報導文學摹寫自然和人生，須發揮文學的感染力，將作家主觀關照下的客觀世界重現出來。¹⁶

沈謙所言之第一部分即有三要點，「作者應該提供背景的認知，挖掘事實背後隱藏的意義。」、「作者在選擇題材與落筆時必須有其文化理想。」、「不但要報導表面現象，還要探尋根源，除了外在活動的記錄之外，還要有精神的關照。」就《南方移民村》而言，濱田隼雄便對於化名為鹿田村之鹿野移民村背景有大量敘寫：

¹⁵ 高信疆，〈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台北：東大，1990年），頁26-27。

¹⁶ 沈謙，〈精神的關照·文學的感染——評古蒙仁的報導文學急《黑色的部落》〉《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8.4.29-30。

大正元年(1912年)，資本金三百五十萬元的製糖公司在台東設立。三百五十萬是大資本，但並非在三井、三菱庇護下的公司，而是內地小資本趁著砂糖景氣，可以說是把殖民地利潤的一部份轉給而建的公司。在台灣西部豐饒的甘蔗地已由大財閥佔有，在東部立地條件不利，交通不便。¹⁷

濱田隼雄往前溯及 1912 年的經濟政策，對殖民地的經濟狀況進行一番梳理。直接提出移民村的成立概況，並且揭露 350 萬的資本額，並非由主要企業三菱、三井提供，撇開全球化的三菱企業不談，光是三井銀行，在 1912 年時的資本額就以高達 1500 萬元¹⁸；濱田隼雄特意以資方的角度來暗示鹿野村的成立背景，不以財團為主、而是民間私人集資而成，悄悄透露製糖業在當時代的願景與可能。

另一方面，參看《台東縣志》即可發現濱田隼雄在經濟背景的敘述與史實相切合，「大正元年(1912)安場末喜、若尾彰八等人申請成立「台東製糖株式會社」，資本額 350 萬日圓，以製糖、移民、開墾與興辦鐵路為主要業務。」¹⁹濱田隼雄所書寫的糖廠即是現在的台東糖廠，台東糖廠的前身即台東製糖株式會社，創立於大正二年（1913），正好是籌措資本的隔年。如此年份與地點乃至事件，甚至是金額的吻合自然不是湊巧，可見濱田隼雄所欲揭示的真實面便符合了沈謙所提及的第一部分第一要點，「作者應該提供背景的認知，挖掘事實背後隱藏的意義。」

濱田隼雄以糖業來看東西部的經濟差異，「在台灣西部豐饒的甘蔗地已由大財閥佔有，在東部立地條件不利，交通不便」，在經濟條件之外，說明了地理性的差異，暗示東部糖廠及其移民勞工未來可能的命運，而東西兩岸的糖廠勞工又各有不同的考驗，因製糖廠而生的私營移民村所面臨的除了心境上的不適應外，伴隨而來的多是東部環境上的不便：

¹⁷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39。

¹⁸ 三井住友銀行為 1876 年創立，初為三井銀行，至 1912 年設立住友銀行，資本額達 1500 萬元，是現今日本第三大金融機構。其他歷史沿革參見官方網址：<http://www.smbc.co.jp/aboutus/profile/history.html> 最後上網時間：2013/6/20。

¹⁹ 《台東縣志 開拓篇》（台東：台東縣府，2001），頁 114-115。

他們就像被拋棄了似的。……而醫療設備沒有，發燒的痛苦和疲勞，使村子的勞動力任其低落無暇顧及。

生病了，必須到台東街上去看醫生，從地圖上看來到台東需要二日時間。附近的山地還有尚未充分歸順的蕃人蟠踞，必須警戒著蕃人出草襲擊的危險而上台東。西側的山脈又棲息著比蕃人更可怕的山豬。²⁰

從瘧蚊所引發的疾病及後續醫療問題，乃至東部原住民尚未歸順的恐懼，甚或是居住於山林的野生動物，這些現實生活所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多是西部勞動者尚且不必考慮到的，於此，在糖廠興建的問題之下，跳脫一般勞資雙方的糾紛，濱田隼雄選擇著眼於一群自北國而來的日本移民以及移民村的開拓。他觀照了東西部生活的差異，不只書寫移民的狀況，更書寫蔗糖經濟對當時代的日本所代表的願景，此一視角又與沈謙所論及的報導性之要點「作者在選擇題材與落筆時必須有其文化理想。」、「不但要報導表面現象，還要探尋根源，除了外在活動的記錄之外，還要有精神的關照。」不謀而合。

至於文類的界定，楊逵在〈報導文學問答〉中就曾提到「不管是小說、詩歌、紀行文，或者是書信文體、記錄性文章，甚至日記都無妨。總之，只要具備報導的性質，形式可以依各式各樣的體材，選擇最適當的方式。」²¹當「客觀」與「真實」不須再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被訴說時，或許，在有機的立場之下，也就是書寫事實的動機部分，報導文學本就可以是跨文類的書寫，一如「新新聞學」的定義：

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筆法，來寫新聞報導。它融合小說的創造想像力，及新聞記者的採訪技巧，一反新聞過分依賴新聞來源(news sources)提供消息的傳統，……它所重視的是寫作的格調與描述的品質。它容許記者在報導中投入新聞事件，作主觀的判斷，而非傳統的只能置身事外，作客觀報導。²²

報導與文學的實／虛不再格格不入，應是設法「把文學與報導結合起來」²³，

²⁰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42-43。

²¹ 楊逵，〈報導文學問答〉，收於彭小妍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頁 512。

²² 李茂正，《當代新聞學》，（台北：正中，1987），頁 243。

²³ 高信疆：〈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探索〉，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台北：東大，1990年），頁 47。

「新新聞學」以小說的筆法，讓報導文學開展至第三人稱的敘述視野，以全知的視角帶出敘事觀點；讓報導能配合小說特有的書寫技法，以場景來再現時空，使「真實」得以被重現。雖然對於經過書寫而再現的「真實」一直是報導文學中備受爭議的部份。但這同時也展現在文學的包容面，楊達不僅提出跨文類的見解，也在報導文學的三要點後發出聲明：「報告文學雖然允許對事實作適度的處理和取捨，但絕不允許憑空虛構。」²⁴顯然真實與虛構不該是一翻兩瞪眼的指控，而是經過「適度的處理和取捨」。

如此一來，小說的筆法不只能用以舒展報導文學的書寫困境，秉著楊達最初的立意與聲明，當「報告文學顧名思義，是寫作者以報導的方式，就其週邊、其村鎮，或當地所發生的事情所寫下來的文學」時²⁵，筆者將藉由文本的再審視，讓《南方移民村》得以自報導文學的角度重新切入。

此間將參考學者林淇瀆提出的報導文學方法論。林淇瀆認為報導文學「既以「報導事實」為基礎，寫作就不能憑空杜撰」²⁶，所以真實的部份必須經過多方的了解以掌握事件全貌；依據《南方移民村》的書寫模式以及濱田隼雄的背景看來，其書寫方法多以文獻資料閱讀為主。筆者將於第三節以文獻、史料等資訊與文本兩相對照，以分析之。並於第四節以美國新新聞作家伍爾夫所主張的寫實主義技法²⁷，檢視濱田隼雄寫實主義小說之書寫策略。

三、新聞的眼——看南方移民村

報導文學既與一般文學不同，差異就在其真實面。林淇瀆就報導文學的書寫

²⁴ 楊達，〈何謂報導文學〉，收於彭小妍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頁 503。

²⁵ 楊達，〈何謂報導文學〉，收於彭小妍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頁 503。

²⁶ 林淇瀆認為台灣目前的報導文學書寫模式有二。一是「文獻資料閱讀」，二是「現場調查採訪」。參見林淇瀆，〈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3期(2013.3)，頁 109-112。

²⁷ 伍爾夫所提倡的新新聞小說書寫技法有四，分別為「場景連接場景的建構」(scene-by-scene construction)、「對話全錄」(full record of dialogue)、「第三人稱觀點」(Third-person point of view)、「象徵特定生活的細節紀錄」(the recording of details of status life)參見彭家發著，《新聞文學點、線、面》(台北：業強，1988)，頁 19-21。

模式，提出「文獻資料閱讀」，認為這是一項在報導文學寫作之前應有的工夫，意即在確定報導事件、人物之時，應先根據報導主題已進行相關資料、文獻的搜集與閱讀²⁸。於此前提之下，筆者試圖在本章節以「文獻資料閱讀」的角度來逆推濱田隼雄書寫《南方移民村》時，是否透過文獻資料的閱讀以書寫當時代的現實概況，並以文獻與史料對照文本，檢視《南方移民村》作為報導文學的可能。

《南方移民村》一書以「鹿田村」為背景，自地理位置來看，現在所知的鹿野村與龍田村在日治時期本是同一行政單位，直到 1961 年調整行政區時，方將鹿野村區分為鹿野、龍田兩村，現在的鹿野村成為專指火車站一帶的新聚落，而原本的日本移民村則稱為「龍田村」²⁹。東台灣的拓墾最初是為了紓解日本內地的農村人口問題，而由總督府著手進行對台灣的移民，直到 1919 年由殖產局林務課調查適合移民開墾的地方，目的在除了紓解人口壓力之外，尚須鞏固日本對台的統治、為南進政策做準備以及國防與同化上的任務³⁰。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台東廳適合移居的地點有 6 處，分別是池上村、鹿野村、旭村、美和村、大原村、富原村³¹，其中旭村就是台東廳所成立的第一個移民村地點。濱田隼雄對花東地方的移民村概況亦有陳述：

而且移民村的建設吃了莫大的資金，現今在台灣總督府的產業政策上，認真地考量是否招徠內地移民的問題，即使招徠移民，也限於東部的地方，而且也必須是屬於總督府官營的，……而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以最初的官營移民村建設的吉野村、豐田村，都是需要預料以上的經費，而沒什麼實績，鹿田村成立的翌年，即一九一六年，官營移民事業中止了。³²

就花蓮港廳而言，適合成立移民村的地點有 9 處，文中所提及的吉野村、豐

²⁸ 林淇濂並提出「文獻資料閱讀」的步驟，可分為（一）選定問題、（二）搜集史料、（三）鑑定史料、（四）建立假設和（五）解釋和撰述研究結果。以這五步驟來作為瞭解現在和預測將來的基礎。參見林淇濂，〈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3 期（2013.3），頁 109-110。

²⁹ 《台東縣志·地理篇》（台東：台東縣府，2001），頁 96。

³⁰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頁 18-20。

³¹ 《鹿野鄉志·經濟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 586。

³²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42。

田村，便是花蓮港廳最早成立的兩個官營移民村。而小說的背景鹿野移民村成立於旭村之後，堪稱台東地區開發最早、規模最大，也是日治時期全台最大的私營移民村³³，濱田隼雄在小說中對這個鹿野村有大量的介紹。他提到「這個村子在六年前建立，那是大正四年(1915年)。」點破建村時間為1915年，那麼，被作為原型的鹿野移民村是否於1915年建立呢？參看史料，可發現大正四年，也就是1915年10月：

台東製糖會社建設鹿野移民村，有若干移民開始進駐。大正五年，入村者雖達千餘人，但只有百戶三百餘人有意長住，其餘皆以賺取工資為目的之季節性勞工。以每年五月和十月為期，半數輪流歸返。³⁴

時間上的配合使鹿野移民村與「鹿田村」的關係越見密切，至於移民村的經營方面，又有官營與私營之分，主要是希望本島地區的台、日人口差距縮小，另一方面，藉由內地農民在台墾殖的經驗，有助於日本向南洋的拓墾。政策之外，作為寫實主義作家的文本，濱田隼雄行文過程亦不斷提及台東與鹿野移民村的地景與地貌，首先是對於台東縱谷的敘述：

台東山脈與台灣山脈挾著縱谷，其縱谷有台灣山脈的峻嶺三六六七米的關山，和三三〇五米的卑南主山之間落下的，集著新武路、卡納斯、北絲鬮三溪，卑南大溪流向南，河口附近形成平原，稱為台東平野，台東街橫於河口。³⁵

這段描述了台東的高山峻嶺，從縱谷開始看起整個台東的地理概況，在進入鹿野移民村前，濱田隼雄對移民村所處的地形有如下介紹：

（卑南大溪）它和從卑南主山的山腹落下的北絲鬮溪合流。
險峻的群山之溪，把夏天特多的伴隨颱風而來的豪雨，一下子聚集於北絲鬮溪，溪水湧到這合流點……台地旋即被大約三百公尺的丘陵遮斷，但台

³³ 《鹿野鄉志·經濟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586。

³⁴ 《台東縣志·大事篇》（台東：台東縣府，2001），頁301。

³⁵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22-23。

地有超過一千甲之廣大，在它的懷裡擁抱著鹿田村。³⁶

文本中提到的北絲鬮溪，按照其與卑南溪的關係來看，它就是現在的「鹿野溪」。濱田隼雄在此所敘述的兩溪合抱的鹿田村，是否真實如文本之所見呢？《鹿野鄉志》寫道「西北以鹿野高台崖頂稜線與永安村相連，東北以鹿寮溪下游段與瑞隆村為鄰，東以卑南溪右岸、南以鹿野溪左岸與延平鄉為界。」³⁷可見小說中的移民村確實就在兩溪的合流之處。自地理與歷史兩方下來，足以確認濱田隼雄所書寫的「鹿田村」就是鹿野移民村。

書寫地景之餘，也試圖自當地植栽之不易以及生活的辛勞，乃至天然災害對移民們的挫折談及颱風對於鹿野村的影響。事實上，颱風對於台東的危害不僅於此，由於台東天然的縱谷地形以及短而急促的河流，颱風所帶來的暴風自海上而來，挾帶大量鹽分而成鹽風，而風勢一旦順著縱谷的坡度滑落，又將形成焚風；大量的雨勢不只有山崩、土石流，對於河水環抱的村落，則是容易引發河水高漲進而潰堤，不僅作物有所危害，連住屋乃至人身安全都必須顧慮，濱田隼雄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自然關係對移民們所帶來的困擾：

那乾燥高溫的焚風，籠罩著狹於台灣山脈的這平野，使人人的心冒火，頭腦的蕊燃燒，心情幾乎要發狂的焦躁，使草木的活力疲憊，僅在三、四個鐘頭的時間氣溫跳高十度，溼度銳減百分之四十，像妖魔似的焚風。³⁸

藉由移民的視角來描寫焚風的影響，作物也可能因溼度的改變而收穫不良，濱田隼雄詳細寫下了地形、氣候與作物乃至居民生活形態的關係。至於颱風過境之後，又可能因其地形淤積導致病蟲害與傳染病，危及人畜及作物³⁹。

這些現象在《南方移民村》中可見一二，特別是瘧疾，濱田隼雄藉著身為醫師的圭介來敘述這樣的疫情：「這一次，我覺得無論如何必須做，因為暴風雨，

³⁶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24。

³⁷ 《鹿野鄉志·地理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17。

³⁸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45。

³⁹ 參見《鹿野鄉志·地理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193-194。

造成草叢、灌木叢、低窪處積水滋生瘧蚊，否則，不會有這麼多的新患者。」⁴⁰可見除了地景方面的敘寫外，濱田隼雄連氣候乃至環境的因果關係亦納入其書寫的考量範疇。至於移民開墾荒地、種植作物時，又因為丘陵地形的關係，導致引水不利、排水不便，文中不只一次出現移民們對水源的無奈：

總督府的水利技師來調查河川，嘉兵爺引導隨著巡視時，那位技師說：「真是亂流的河川啊！」一再重複的說這句話。然後說：「那麼，實在無法下手。」感嘆著。嘉兵爺便問，能從何處引水嗎？「是啊。」只這麼說便閉嘴了。沉默不語的反應，嘉兵爺立刻回想起來，這是意味著無法著手。⁴¹

雖然鹿野移民村在地勢上「以鹿寮溪下游段與瑞隆村為鄰，東以卑南溪右岸、南以鹿野溪左岸與延平鄉為界。」然因其台地與丘陵地形，致使水源無法順利灌溉。農民在種植甘蔗之餘，平常食用的稻作也以不同於日本的栽植方式，用旱田的形式耕耘。當糧食無法自給自足，所種植的作物又無法換取金錢改善生活時，這批移民們於是將希望都放在「圳」的建造之上。

在下段的地近河灘，有熟蕃老吧老吧與擺子擺兩個蕃社，石本打聽到，他們希望耕作水田，最近計畫從大約位於兩蕃社中央上游的河灘引水築埤圳灌溉。⁴²

因為阿美族部落的水田化，築圳引水的希望瞬間明朗，沒想到不出兩個星期又有變卦，這一拖，拖到昭和八年，也就是 1933 年才開始進行鹿野圳的工程的：

從北絲鬮溪上游築成的溪水輸入口，引水到水田地帶的埤圳，名叫鹿田圳，包括地方負擔金五千餘元總經費三萬六千三百餘元的預算，工程自昭和八年(1933年)的歲暮開始進行。

因為在道格蘭台地的水田嚐到過痛苦的經驗，所以設計慎重。

從溪流的岸邊穿出隧道，涵蓄著的水田水路長長的通到近於溪灘的水田預定地六十甲餘地域的防守護岸工程，費時約半年的周密設計。⁴³

⁴⁰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21。

⁴¹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28。

⁴²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74。

⁴³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233。

文中所提及的關鍵資訊有「北絲鬮溪上游」、「地方負擔金」、「三萬六千三百餘元」、「昭和八年(1933年)」、「六十甲餘地域」，參照史料的記載，鹿野圳於1933年由台東開拓會社提出興建計畫，所引用的水源便是北絲鬮溪(今鹿野溪)，由記錄看來，鹿野圳興建計畫主要用以灌溉鹿野村以及老吧老吧兩地的為開墾地68餘甲，希望能達到兩期耕作，解決鹿野移民村的飲用水問題。而興建的費用總共36,000 円，其中台灣總督府補助了30,600 円，其餘則由地方，也就是台東開拓會社出資5,400 円⁴⁴。文本裡所提供的數字與時間再一次和現實相符，顯見濱田隼雄書寫的寫實，與前行資料之博覽。他不時將自身切換於人物的虛設以及現實的事件之中，讓小說中的角色再現東台灣日本移民生活樣貌，關於濱田隼雄書寫的技巧與報導文學文本的關係，筆者將在下一節進行討論。

四、文學的筆——談濱田隼雄的書寫

新新聞的書寫避免了傳統新聞報導的敘述方式，讓事件能以自不同的面向呈現；美國新新聞作家伍爾夫主張的寫實主義技法有四，分別是「場景的建構」、「對話全錄」、「第三人稱觀點」、「象徵特定生活的細節紀錄」⁴⁵。依伍爾夫的主張來看，新新聞以場景的組合來勾勒、還原事件的時空，除了場景之外也有人物，透過書中的人物經歷事件，以其視角與對話表現此人物於事件中的象徵性作用，此象徵可能是其社會地位、或者暗示了作者意圖表現的意識形態等等。《南方移民村》做為濱田隼雄寫實主義小說的代表作，筆者試圖將之置於伍爾夫所主張的技法，以探看其書寫技法與報導文學小說文本的關係。

首先是「第三人稱觀點」，《南方移民村》為一以全知觀點書寫的小說，行文過程中無法看出作者的介入與任何後設視角，因此自然符合第三人稱觀點之要求。至於時間與空間上「場景的建構」，當濱田隼雄提起書中的移民村時寫道：「這

⁴⁴ 《鹿野鄉志·經濟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645。

⁴⁵ 彭家發著，《新聞文學點、線、面》(台北：業強，1988)，頁19-21。

個村子是在六年前建立，那是大正四年。」⁴⁶選擇不從建村之始寫起，更暗示了敘事的年代為建村後六年。讓人不禁好奇濱田隼雄特意將時間推後六年的用意何在？

依照《鹿野鄉志》記載，台東廳的移民事業是由大正二年(1913年2月)成立的台東製糖株式會社所執行，爲了製糖工廠所需的原料，於官營移民預定地上招募內地移民以栽培甘蔗。這同時又牽涉到濱田隼雄所書寫的那群來自「雪國的農民」，因冬季降雪無法耕作而願於11月至4月間成爲短期移民來台開墾⁴⁷，所牽涉到的租金與人數以及移民概況，濱田隼雄亦有書寫：

第一批二百二十八人的季節移民，在一九一五年來到台灣。是像候鳥般全是男性的一隊，……對他們來說，到台灣來回的火車票、船票均由公司負擔，現場的糧食由公司免費發給，工資按工作量計算，一天的工資大約有八、九角錢到一元五、六角錢，從十二月到四月底，最少可以賺到二、三十元，聽了公司的宣傳而來台灣的。⁴⁸

對於這樣的工作性質，不難看出移民們候鳥似的心態。來自日本內地的移民始終將自己視做過客，那些因爲移民政策而來的內地人，更多是想要擁有「自己的土地」而飄洋過海。但因移民須耕滿約定的年限之後，方能取得自己的土地，長此下來，故事中也不乏第一代移民們想要「死在出生的土地」的情節。

另一方面，若從施添福的統計資料看來，鹿野移民村戶人數在大正11年(1922)起開始有本島人口移入⁴⁹，於是也才有小說中本島人與內地人的生活對照。在這裡，濱田隼雄藉由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對比，突顯出移民者離鄉背景的心情以及拓荒過程中的衝突。除了以敘述句表現外，也反映在角色間的對話。林淇瀆就曾在報導文學中所使用的對話與敘述句之效果有所討論：

報導文學寫作除了一般的敘述之外，對話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敘述，是散

⁴⁶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39。

⁴⁷ 《鹿野鄉志·開發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頁250。

⁴⁸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40。

⁴⁹ 《台東縣志·開拓篇》(台東：台東縣府，2001)，頁117。

文書寫的主幹，對話則常為小說所用。好的對話，可使報導文學增添活潑、生動的氣氛，也有助於輔助敘述的不足。⁵⁰

帶著這樣的視角，來看以下這段指導員國分用以激勵彌太郎時所說的話：

扎根於土地的是本島人。內地人像寄生蟲一樣。在這一點上移民不同。他們不只進入本島人中，一樣的在這個島上的大地下根，他們還把尚未開拓之地順利開墾了，真的不能不把這土地成為屬於自己的。……把日本的農業帶到這裡，這即是發展國威。若是移民家庭的父叔輩對於這一點認識不清，你們下一代年輕人必須有堅定的精神。⁵¹

國分明確指出身為移民的第二代，必須要更加積極完成父執輩們無法完成的志業，在殖民地台灣生根。明顯可看出當時移民的心態，多是因利益而來，亦不難發現，第一代與第二代的思維已開始轉變。濱田隼雄書寫了這段對話不僅暗示彌太郎父子各自不願言說的堅持，也由指導員的口中指出移民村未來的方向；國分站在指導員的角度，提醒移民的第二代該想的應是「真心想要把這塊土地變成自己的土地。」並且「將日本的農業擴展到台灣，發揚國威」。

朱惠足的研究曾針對本島人與內地人相處所暗示的教化行爲，指「內地人」農業移民雖然並非國家派遣的行政統治官員，但由於與「本島人」及「蕃人」在生活於同一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更能有效地教化台灣的被殖民者⁵²。這樣內地人／本島人／蕃人並存的時與空，族群之間各有牽動，也不難理解濱田隼雄將文本的敘事時間向後推移的用意了。

其次，就人物形象而言，《南方移民村》以日本移民為主要描寫對象，文本中的移民大致可分為兩種表現，一是帶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如醫生圭介、警員石田，還有指導員國分；二則是普遍困頓無助的移民村農民們。當濱田隼雄藉著醫

⁵⁰ 林淇濂，〈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3期（2013.3），頁116。

⁵¹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76-77。

⁵² 朱惠足，〈日本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開拓先鋒——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的東台灣「內地人」移民〉《文化研究月報》第二十四期（2003.2.15），最後上網時間：2013/6/20，網址：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24/journal_park161.htm。

師圭介的雙眼，自西台灣的視角轉而看見東台灣的移民時，第一個引發的事件便是酗酒的治郎作闖禍之後，其妻來到圭介家中，在傷者枕畔哭泣，圭介感到詫異，並且意外：

她的神情顯露出生活多麼的疲憊，完全失去了光澤的皮膚蒼黑，眼尾小皺紋聚集，呈現出比她實際的年齡老的樣子，消失了光澤乾燥的枯髮發紅，清楚的表現出體內的營養不足，真是令人不忍卒睹的落魄潦倒。⁵³

濱田隼雄安排了這場帶有衝突性的初次見面，顛覆圭介、或者一般內地人對這群在台灣耕作的農民們的看法。至少，談及內地人，圭介想到的多是政府官員或公司職員等等，即使說到移民村，也應該是比本島人農民還要更不錯的樣子才是，然而圭介眼前所目睹的竟是「在內地來說也是極貧農民似的，落魄的樣子」⁵⁴。事實上，這落魄的樣子便是移民村農民的寫照。

對於這樣的衝擊與反思，濱田隼雄在指導員國分死後也有所探討：

他(國分)生長在台灣，原相信內地像夢一樣美。他以為那裡的人比在台北的內地人過著更好的生活。

然而他去了，看到的是有許多戶同住，房屋簡陋的大雜院，有窮人，在台灣只有本島人裡僅見的叫化子，在內地也有這種乞丐，所以他一上陸，便大失所望。……他在台灣長大，看見的是本島農民在泥水中爬行除草的樣子。與內地農民之姿有異。當然並非他以為內地無農民。但眼前實際看到內地農民連臉都微沾泥土的工作情形，他感到出乎意外。……

內地人，所以是優越的，這種極其單純的想法所教育的錯誤，他自己清楚地感覺出來。

是由什麼來決定人的價值呢？他不得不思考這問題……⁵⁵

國分的死亡為移民村帶來不小的衝擊，國分雖然身為指導員，卻親自下田與村裡的農民同甘共苦，幾番向會社爭取農業工事經費、鹿田村建設，以及防禦山豬進入田地的柵欄、灌溉水田用的水壩。從上述幾點可看出他處處為村民設想，

⁵³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30。

⁵⁴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30。

⁵⁵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55。

最後竟因擔憂得來不易的水田，在暴雨過後前往查看而被吞沒於潰堤的濁流，國分的形象可以說是濱田隼雄特意安排的、跨越階級的代表；濱田隼雄利用其知識分子的視角劃破了階級的想像，當內地人不一定等同於殖民者，身分的優越也不是建立在種族與種族間，這群農民是一群無產階級分子，他們積欠會社債務，也沒有遷徙的自由。在國分死後，由其父母來交代國分的成長經驗；原來，國分自小在台灣成長，對內地充滿美麗的想像，卻因返回內地而夢想幻滅。他才知道內地人不是全都有亮麗的生活，空有殖民者身分卻落得無家可歸，總是被經濟與政策左右著的人民，才該是所有人都關注的社會死角，濱田隼雄選擇讓圭介與國分來發掘，這樣的安排許是打破階級的開始。

而濱田隼雄所安排的知識分子角色，除了用以協助改善移民生活之外，尚有建設的推動等幫助。農民以治郎作為代表，其苦悶象徵在借酒澆愁，更在酒後發生了傷害事件。此時，警察石本便成為第一線的遏止：

治郎作，若我將你辦案了，你將落入困境，也會成為村子之恥。在鹿田村有內地人同鄉打架，終於被關入監獄，若消息傳到本島人或番人之間，便是暴露了內地人之恥呢。⁵⁶

濱田隼雄藉著警察石本來對治郎作的酒後鬧事提出警惕，如此透過知識份子的身分來對民眾提出個體意見與看法，就薩伊德論知識份子時，便提到知識份子的中心事實就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⁵⁷，知識份子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就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從而點破令人尷尬的問題。石本便是如此，對治郎作的酗酒行為一語道破，規勸並提出同是內地人所應注意的事情。

為了解決內地移民們因生活貧困而借酒澆愁所衍生的問題，另一位知識份子代表——圭介，則推動戒酒同盟組織：

⁵⁶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36。

⁵⁷ 薩伊德，《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2004），頁48。

圭介首先想做的是，組織一個「戒酒同盟」，因為水田失敗後，一些村民又再喝酒，他想掃除這習慣，促進村民奮起精神，希望從精神上的甦生開始。⁵⁸

郭祐慈與林雪星都曾在其論文中考證神野圭介與神田全次的虛實關係，兩人的形象多有重疊之處，⁵⁹文本中的神野圭介總是夙興夜寐地往來於台東各地，只爲了診療病人，遏阻瘧疾。對於勸誡戒酒的事情，濱田隼雄是這樣書寫的：

圭介自己出面勸導自不待言，連石本也常常勸導戒酒，贊成藉酒者漸漸的有了。……圭介明白這種情形，起初就沒希望全部都說服，順其自然，並不硬勸導。由於圭介的諄諄勸解，發誓戒酒者已經有了將近二十人。⁶⁰

真實存在的神田全次，自願從高雄轉赴台東鹿野村擔任「囑託醫生」，並因其從事衛生醫療事務的精神，對居民分毫不取的態度而被稱作「鹿野慈父」。神田氏在處理村民酗酒方面，選擇在鹿野移民村組織向上會、尚武會：

尚武會是讓村民利用農暇練習劍道、柔道，向上會則固定在每月 20 日晚上舉辦民風作興座談會，……主要目的是：協助移民村青年戒除抽煙、酗酒惡習，教導村人醫療保健觀念。⁶¹

這又是一場虛構與真實的辨證，濱田隼雄利用知識份子的形象，以神田全次爲雛形，改寫了促進鹿野移民村建設的推手。濱田隼雄選擇讓神田全次不以原本的面貌出現，反而化身爲神野圭介，與石本、國分等角色一同改善鹿野移民村。這些知識份子的形象，建立在協助村民向會社主張權利，以對不平等的待遇發聲。他們選擇站在無產的移民這方，一如薩伊德所言，「知識份子要代表著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勢的人」。⁶²濱田隼雄握著文學

⁵⁸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95-196。

⁵⁹ 參見郭祐慈，〈文學與歷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文學史定位〉《台灣風物》56 卷 3 期，頁 128-130。林雪星，〈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裡的知識份子表象——以醫生神野圭介為主〉《東吳外語學報》29 期，2009.9，頁 61-80。

⁶⁰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 195-196。

⁶¹ 林韻梅，〈神年全次(1878-?)〉《台東縣志·人物篇》（台東：台東縣府，2001），頁 219。

⁶² 薩伊德，《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2004），頁 95。

的筆，以一貫的社會主義意識來策動移民村中的知識份子。

當社會主義的思想融合在國分、石本以及圭介身上時，他們用對話及行動改善移民村，並使文本中的時與空得以表現出「特定生活的細節」。然而，在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一切俱為真實的情況下，選擇將人物虛構，這樣的書寫明顯與一般歷史文本不同，也突破了我們對歷史的印象，歷史也不再只是人物生活的痕跡。再者，知識份子與無產階級們的互動，不僅讓濱田隼雄的左派意識得以聲明，這樣帶有衝突性的情節與視角，因著文學的技藝，使鹿野移民村開墾時的困境，得以銘刻於讀者的記憶，以打動大眾的心，從而實現報導文學「最高的藝術」。

五、結語

《南方移民村》作為寫實主義的文本，清楚呈現私營移民村的背景與脈絡；由台東製糖會社主導之下，以營利為目的地奪取移民們的生存意志。這樣的設定，暗示一群生活在鹿野移民村的內地人與殖民者身分的矛盾關係，濱田隼雄藉著虛構的人物來重現當時代的歷史背景；用文學的技法，以小說的方式報導現實。據此以探究《南方移民村》作為報導文學的可能，發現就意識而言，濱田隼雄所具有的社會主義傾向，首先符合了報導文學的主觀意識條件。

其次，筆者藉由文本與歷史的兩相對照，探討其真實性，發現濱田隼雄所特有的「新聞之眼」。雖然史料無法呈現人物的生活，而小說中的人物又多是虛構，但就「文學的筆」來看濱田隼雄小說中的書寫策略，無論是「場景的建構、對話、第三人稱觀點、象徵特定生活的細節紀錄」等，俱吻合伍爾夫對於新新聞小說所提倡的「寫實主義技法」之表現。

進一步來看濱田隼雄所書寫的角色細節，廣義而言可直接分作「知識份子」與「農民」兩種，他透過知識份子的眼睛，看出移民者／殖民者／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矛盾；當移民者不等於殖民者，而內地人又必須被區分為資產與無產階級時，知識份子則扮演了為弱勢發聲的角色。

文學的情節與技巧，成爲讓事件得以被延續的一門藝術，濱田隼雄曾提及書寫《南方移民村》的立意，便是想讓連生活在台灣的人都不知道移民村情形能被看見⁶³。如此意欲揭露事實的動機、以及其背景資料的搜集與博覽，配合其寫實主義小說的書寫技法，足證《南方移民村》允爲報導文學文本。

⁶³ 黃玉燕，〈濱田隼雄與《南方移民村》〉《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頁12。

參考書目

專書

- 《台東縣志·人物篇》(台東:東縣府,2001)
- 《台東縣志·開拓篇》(台東:東縣府,2001)
- 《台東縣志·大事篇》(台東:東縣府,2001)
- 《台東縣志·地理篇》(台東:東縣府,2001)
- 《鹿野鄉志·開發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
- 《鹿野鄉志·經濟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
- 《鹿野鄉志·地理篇》(台東:鹿野鄉公所,2006)
- 《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
-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
- 向陽、須文蔚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
- 李茂正,《當代新聞學》(台北:正中,1987)
- 陳銘璠編,《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台北:東大,1990年)
- 彭小妍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台南文學館,2001)
- 彭家發,《新聞文學點、線、面》(台北:業強,1988)
-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4)
- 薩伊德,《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2004)

期刊論文

- 朱惠足,〈日本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開拓先鋒——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的東台灣「內地人」移民〉《文化研究月報》第二十四期(2003.2.15)網址: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24/journal_park161.htm,最後上網時間:2013/6/20。
- 林淇瀟,〈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3期(2013.3),頁97-121。
- 林雪星,〈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裡的知識份子表象——以醫生神野圭介為主〉《東吳外語學報》29期(2009.9),頁61-80。
- 郭祐慈,〈文學與歷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文學史定位〉《台灣風物》56卷3期,頁105-138。
- 橫路啓子,〈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論——以「更正」為中心〉《東吳日語教育學報》36期(2011.1),頁105-128。

報紙

- 沈謙,〈精神的關照·文學的感染——評古蒙仁的報導文學急《黑色的部落》〉《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8.4.29-30。

